

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

宋振华 著

1.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语言论著选编

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

沈家本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

宋 振 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

著 者	宋振华	
责任编辑	卢 绵	封面设计 佳 羽
责任校对	宋 抵	版式设计 宋 抵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人民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	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5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712-1/D·1006
定 价 22.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序 一

振华远行已经快两年了。前些日子,振华的几个孩子到我这里,带着几经整理与核对的乃父的遗著——《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让我作序。序是要评介著作的内容的,我不是搞理论语言学的,对振华倾半生之力的心血结晶,我无从置喙;从另一方面说,我和振华是有近 50 年交往的挚友,作序的事又无从推脱,所以就应承下来。我想在这篇算不得序言的序里,说说我所知道的振华写这本书的前前后后的经历和我所看到的他平日的处世为人,就算是一篇寄托个人哀思的悼念文章吧!

振华是 1948 年投奔解放区的,被分配在佳木斯东北大学四班学习。迁校吉林后被调出作教育干事。对前半生,他很少谈起。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他出生于吉林,青少年时期家境清苦,他主要是自学成才的;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当过乡村的小学教师;爱好文学、美术,对语言和传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东北光复之后,他曾在长白师范学院英文系学习,组织过读书社,从事过民主运动,写过不少文章。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而投奔解放区。

我是 1953 年和振华结识的。此前,振华在校部教学研究室工作,是对教学和语言学的兴趣促使他重返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的。

1953 年正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传到中国的时候。此前中国语言学界关注的主要是语言学的专业、专题的研究,理论领域很冷落,而且马尔的“学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传入后,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语

言理论成为注意的焦点；清算马尔语言学说、批判语言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形成一个小高潮。在苏联，1953年契克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出版，东北师大中文系也酝酿开设“语言学概论”课。当时，国内大学很少有开设言理论课的，教材无所依傍。经大家商量，由刚从俄语短训班学习过的高瑞卿、曹淑芬和我分头翻译契克巴瓦的《语言学概论》，由孙常叙师和振华两人共同讲授。我们边翻译，他们边讲授，译一章讲一章，就这样跟斗把势的，总算开出了“语言学概论”课。

1956年左右，语文教研室一分为三，成立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三个教研室，振华成为语言学教研室的主持人。从此振华和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他谢世。

据我看，振华的言学研究可以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是模仿阶段。这一时期，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主要是争取能开设语言学课。语言学的内容是以《斯大林论语言》为纲，以契克巴瓦的《语言学概论》为骨架的，所从事的是移植、消化的工作。其代表著作就是作为师大函授教材出版的与王今铮合写的《语言学概论》（1957年版，后又修订再版）。作为函授教材和最早出版的言理论书籍之一，该书在言学教学和言学普及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内容上来说，除个别部分之外，总体上照契克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并没有大的突破。1957年之后，在极“左”思潮泛滥中，他也曾和同时代人一样发过高烧。他一度试图突破契克巴瓦的框架，去建树“毛泽东思想言学”。其结果走的是一条弯路——把党的言政策当成言学的规律。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留下的是苦涩的教训。

后期是他对前期进行反思、摸索言学新道路的阶段。60年代末，振华插队落户在安图县两江公社。在偏僻的乡下，在万马齐

暗的时代,在离群索居中,他开始了他的反思。通信中我知道他曾想彻底探讨西方的语言学,无奈苦于与世隔绝,无从接触西方的语言学著作。不甘于无所作为的他只好另辟蹊径,根据他手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没出齐)去向马克思、恩格斯作调查,试图把马、恩关于语言和语言学的论述贯穿起来,去探索马、恩是怎样从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观察语言的。插队归来和几乎整个70年代,他都沉浸在这一工作中,其成果就是1979年在校内印刷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学活动编年》。调查所得的初步成果,在振华与刘伶编著的《语言理论》中有所反映。

调查马、恩、列、斯关于语言和语言学的论述,这也曾是振华早年的愿望。早在1955年,振华就从当时能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和已出版的几卷《斯大林全集》中辑录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及语言学》,由校内印刷厂印刷发行。据我所见,这是这类辑录中的第一本;《编年》是它的马、恩部分的扩展。他早就说过:“一言一句、只字片语的摘录,不难想像,对导师的原作总是有损伤的。这种罪过和欠缺是难免的;由宝石碎屑怎么能看出宝石的原形呢!”他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就是《编年》的后继工作。他试图用这本书勾勒出马、恩的语言思想的轮廓,阐发马、恩关于语言的论点,并作为自己今后语言思想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也是振华的语言学思想的升华、成熟的标志。

振华从事马、恩语言学思想的辑录和阐释,从60年代算起,整整用了30年的时间:前10年用于辑录;后20年用于阐释。如果说辑录只要有时间、有决心还不难做到的话,阐释就要融会贯通,就要有思想,有见地,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人就很少了。在振华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可以说是朝于斯、夕于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

著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专门论述语言的不多，涉及语言和语言学的却不少。振华是述而不作的，是代马、恩立言的。他不能像写个人的专著那样去任意发挥。他处处要避免断章取义，处处要防止离开马、恩的原著、原文，这就难上加难了。他既要从整体上把握马、恩的思想体系，又要从具体篇章中去吃透马、恩的片断论述，从片断论述中去归纳马、恩对语言的整体思想，须下的功夫可想而知。翻阅振华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后期的记载，大部分都是分析马、恩关于语言的语录的心得体会。这些记载有的是晚上记的，有的是凌晨突发的奇想，有的是半夜起来录下的偶得；其食于斯、寝于斯之状，由此可以想见。从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不断重新排列卡片、归纳分类的；看到他是怎样不断拟提纲又不断推翻的；看到他是怎样不断列细纲又不断更改的；看到他是怎样反复读写马、恩的著作并整理归纳他们所用的术语的；看到他是怎样为每张卡片作分析记录的……。其投入之深、严谨之状，跃然纸上。在他的分析中纠正了前人不少对马、恩的误解。比如，过去我们都把“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当成马、恩的语言思想的基本命题。振华反复查阅《德意志意识形态》，发现这实际上并不是马、恩的正面意见，而是所引用的对方的错误论证。那些“哲学家”正是在这个错误论点的基础上，导出一系列的谬论：认为语言就是现实，批判言词就是批判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王国”。马、恩的正面意见是：“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由此可见，不从马、恩的哲学、历史思想出发，仅仅从马、恩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会造成多么大的谬误。

从马、恩的原著出发，从马、恩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出发去阐述马、恩的语言观，得其真谛固然难，阐述起来又谈何容易。振华仅

“语言发展”一章，前后就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称得上是艰苦卓绝了。他这般的毅力和严谨，一般人怕是很难作到的。这也正是振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的价值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不仅对语言学是个巨大的贡献，不仅在语言学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弥补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观念的片面性，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作了深入的探索。虽然这还只是初步的，但也是难得的。

如前所述，我对语言理论是个外行，对振华的语言学活动和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我只能说到这里。其真正的价值只能请语言理论的专家去评说了。下面我想转入交往中我对振华的了解，希望大家也能多了解振华，也算我对振华怀念的一部分吧。

振华是自学成才的，他也一生坚持着自学。他自己把“自学”称做“修业”。我初识振华时，看到他桌旁墙上总订有一个一周的时间安排表，其中严格地规定了一周的活动内容——读书、写作、备课、会议、总结……。我是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兴来可以不要命，兴去就抛到一边，所以对他这种严格地按计划行事大不以为然，内心嘲笑他“机械”、“刻板”。他却这样坚持了一生。晚年虽不周订月结了，仍是年初规划，年末作“纪年”去总结，一丝不苟。

他的阅读范围极其广泛，国内外的语言著作自不待言。此外，传统的诸子百家、释道作品，自然史与考古学，文学与美术……，都是他涉猎的对象。下面是他晚年订阅的报刊资料。刊物除语言专业的应有尽有以外，还订有《哲学译丛》、《中国文化研究》、《人类学学报》、《化石》、《考古》、《联合国纪事》、《信使》、《中流》、《美术》、《美术研究》、《讽刺与幽默》……；人大剪报资料，除《语言文字学》和语言学卡片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总论》、《文化研究》、《美学》、《造型艺术研究》等；报纸则有《光明日报》、《新民晚报》和《长春日报》。这些报刊杂志，他都是天天浏览的。重要的、感兴趣的文章，

他都仔细阅读,有的还要写出读后的所感或随想。看一个人的书架就可以知道那个人的眼界,从振华涉猎范围就可以知道他的视野。振华就是这样厚积而薄发的。他一生坚持着:修业要有计划,不急不拼,连绵不断。

我们这些狭隘的专门家,有时会从他的讲课和讲义里指出他在个别问题上的瑕疵。是的,在专门领域中,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纰漏;可是在总体上,很少有人想得像他那样深远。他关心的不是细节上的得失,而是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的分辨;他没有在语言学的微观问题上进行“穷尽”的研究,但他在宏观领域具有很高的洞察力;贬低资料性、技术性、描写性、考据性的研究是他的不足,能进入哲学性、历史性的高度去思辨语言的发生与发展、语言外部与内部的种种联系与区分则是他的长处。振华是个诗人,他有诗人的想像和激情,但在语言问题上他却像个哲人,只关心形而上的思索。即使他一度着力的修辞学与语义学,他想的也是深层次的理论,很少涉及技术性的细节。

一生的“修业”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所锻炼出来的观察力,使他在许多问题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语言学为例:他从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历程中看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片面与肤浅;他从语言处于不间断的变化中看到了把语言结构的探索置于中心位置的结构主义的弱点;他从那些大谈汉语研究中的“反印欧语眼光”者的背后,察觉到他们的印欧语言理论的框子;他从强调民族化过了头、强调传统走极端者的背后嗅出了国粹主义的复活;他从某些夸夸其谈的标新立异者的言论中看到了他们的浅薄……。没有广博的积累,没有对历史的考察,是不会有这样犀利的眼光。

振华一生很注意养生。养生、修业、著述成为贯穿他一生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圈;“养生在于恒,修业在于勤,著述在于实”,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艰苦的学习与生活条件使振华青年时代就患上了肺结核，不时吐血。瘦弱的身體和艰难的环境使他懂得了健身先于一切。他自称他这一生是“老牛拉破车”。老牛破车又要负重行远，只有不急、不拼，着意养生。

在养生上，他只信己，不信药。他把服药看做次要的手段，把自身调节、求得身心平衡放在首位，把持之以恒当做关键。

在振华的督促带动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参与了他的健身活动。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我们天天黎明即起，一起到南湖去锻炼。在锻炼上他有一套独特的做法和名称：比如他把跑得大汗淋漓然后作深呼吸称做“风调雨顺”；把先踮起脚尖走路之后变成脚掌用力顿地走称做“上天入地”……。当身体不允许作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就改为每日绕南湖走一圈，他把这叫做“逍遥”或“逍遥游”；把在南湖大堤上比赛数对岸的树木以增强视力，称做“韩信点兵”。几十年来，南湖成为他的健身房，除了晚年的寒冬，他从未间断。他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与意志，委实让我这断断续续的追随者感到佩服。

人在离退之后往往有一种失落感。他在“离岗”（他自己不叫离退休）之后却说自己觉得有新生之感，好像又脱了一次胎。没有压力感，没有负担感，有的是一种自由和轻松，是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喜爱的读书、写作的新起点，生命的新起点。我在“离岗”之后，尤其老伴去世之后，曾经很消沉，想搁笔罢读，颐养天年。熟识的人也都劝我，余日不多，何必自苦。惟有振华不同，他以“残年更比黄金贵”来勉励我继续前进。我们俩都患有肺气肿，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喘友”，每年冬季要猫冬。我把“猫冬”常戏称“蹲仓”、“蹲监”、“下蛰”、“冬眠”……；他不同意，他把猫冬称做“冬节”、“冬假”，认为这是一年的收获季节。

振华自知衰老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他要用养生来延

续衰老的速度。在这个意义上他要“回春”，要超越老年这个禁区。他日记上的箴言是：“太阳是新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需要延年，把寿命延长到80岁，100岁。他所以要争取多活，因为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常常谈起，《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只是奠定他的语言学思想的工作，随后他想写可以由他发挥的《语言学理论》、《语义论》、《修辞论》；他还要整理数十年来的读书随感，要写语言评论。他有许多梦想，他想圆他的文学梦，从语言学抽身，“复归”文学，写诗，写文艺作品、随笔，记述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他相信经历了漫长的生活和思索之后，新的文学活力会再次涌现。他倾心美术，休息时常画一些小幅书签之类。早年多画鱼，自称“万尾鱼主人”，晚年多画君子兰、龟背竹、苍松、葡萄……。铅笔勾勒，水彩淡涂，自成一格，很有情趣。他想了却了语言学心愿后重操画笔，圆他的美术梦。他有许多梦，所以他着意养生；他有许多待完成的梦，所以他有着紧迫感。他要向老年要效率，他要既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他说过，他常作赶路的梦，拼命赶路，赶了一程又一程，醒来口干舌燥，浑身是汗。他自己引申出的结论是我还有力量赶路，从未累倒过。我想，梦实际上反映的是老之将至的压迫感。不管他怎样注意养生，怎么标榜他的“不拼不急”的“从容主义”，紧迫感还是逼迫他超值工作、忘却限度，最终导致他1997年初的脑溢血。脑溢血之后，他明显地衰弱了，脚步蹒跚了，语言不清了。虽然经过他多方调理和锻炼，又恢复了户外活动，但他似乎明显地感到了末日的威胁。在一次会面中，他已经不再提他的庞大远景；他所关心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的出版……人哪，谁知道极限在哪里？老牛破车终于力不从心、回春乏力，终止于76岁。人定胜天，养生使他比他预期的寿命多活了十来年，终于活到了76岁；人究竟不能胜天，抱着无限遗憾，他终于死在了76岁。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振华是个高傲、孤僻、不近人情的人。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走在路上他总是背起双手,目不斜视,一脸严肃,一本正经,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让人望而却步;会议上他总是正襟危坐,最后发言,如作总结。于是“老古板”、“老教条”、“老倔头”……,成为好多人的口碑。对此振华我行我素,从不置辩。可是走近振华,走进他的生活就会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错觉。近处的振华是很平易近人的,而且不乏幽默感。

振华历来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他处事很替别人着想。中文系流传过一则嘲笑振华迂的笑话,说他在安图插队时,冬日去打水,井台结冰,他不慎滑入井中,他靠在井中不叫不喊,一个来打水的妇女发现他,要救他上来,他对来说:你回去吧,井里很好,很温和。就此事我向他核实过。他说确有其事,不过不是让她回家,是担心她也滑下来,让她回去喊个男人来。身处井中,他还在替别人打算。振华晚年以习字作为养生一法,他最常临的是钟繇的《繇白帖》。我想他除了爱钟繇的书法外,还因为帖中的“审己而恕物”的思想很符合他的处世哲学之故。在我们共事的过程中,他总是推功揽过的。他很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他总鞭策别人上进,有长者之风。他把我看做小弟弟,常用兄长般的宽容来对待我的任性,用不断的鼓励来消除我的惰性。我们之间可以称得上是其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有的只有相互支持,从无酒肉往来。振华对后学后进更是满腔热情。他是自学成才的,所以他对坚持自学的人总是奖掖有加。他的家里常有工人、职员、教师来访,他总是热情地接待和予以鼓励;对来信求教的人,他总是有信必复,而且是立刻作复,循循善诱;对新人的有新意之作,他常常主动写信去表示支持。经他推荐后来小有名气的自学成才者就有高长江、叶楚强(早期汉字编码探索者)等多人。

另一方面,振华也确实自视甚高。他很自信,从不随声附和。

他的思想受古代文人士的影响很深。在古代的哲人中,他最喜欢的是老子、庄子、墨子。他接受了古代哲士文人的淡泊名利、看重风骨气节的熏陶,也接受了他们的孤芳自赏,从不趋炎附势;他反庸俗,有时一意孤行。他是个涓介之人,不懂中庸之道。他一生中犯过许多错误,尤其在全民发烧的时代,他凭着他的信念行事,往往走得比别人更远、更彻底、更极端,因而也误伤过许多好人。不过,这是君子之过,并非出于一己之私。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何况冷静下来,他的反省与自责也是很彻底的。对社会的不良风气,他从不同流合污、扣泥扬波。比如“文革”后恢复高考期间,有人托他捎条子给一位系领导,他竟从中没收,惹得这位领导大发脾气;比如他的二儿子宋抵1977年报考,成绩高出录取线27分之多,只因年龄偏大怕不被录取,求他向系录取人员打个招呼,这个招呼他硬是不肯打,逼得孩子来求我帮忙。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晚年他自号“广寒叟”,命其居室为“广寒庐”。既然无能为力,只好洁身自好,置身广寒官中,静观人世变化;内心里,他则坚信正义必定压倒邪恶,社会公正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不像序的序不知该如何收尾,姑节录得到振华噩耗的日记为结,以寄托我的哀思。“……猫冬前去看过他两次,(谈话中)预感到他将不久于人世,没想到这样快。上次看他,曾采经霜红叶为赠,竟成凋零之谶。

……

呜呼振华,猝然长逝,
环视当世,谁复可师。
忆君当年,博学勤勉,
周订月结,自我加鞭。
南湖长跑,雨顺风调,
自学共勉,意在创造。

我尝怠情，顾君自惭，
我尝放纵，见君汗颜。
君之自责，既刻且严，
君之操守，驱我向前。
君之皓皓，常遭诬枉，
从不置辩，独来独往。
嗷嗷呜呜，不置胸中，
我行我素，谗诮罔顾。
行吟泽畔，屈子兴叹，
扣泥扬波，了非所愿。
独善其身，卓尔不群，
清高傲世，白眼视人。
当此潮流，独行难能，
噫微斯人，吾谁与同！
.....

王凤阳

2000年10月12日

序二

欣喜国内著名理论语言学家宋振华先生的遗著《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即将付梓,激动得彻夜难眠。我暗自为中国语言学事业庆幸,也为宋先生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而聊以自慰。一位蜚声学界的语言学前辈,一部深邃的开拓性的语言学名著要我来作序,实乃惶恐之至:藐予小子,安敢造次!但我与宋先生深刻的情份及向社会介绍这部书的思想贡献的责任感,又使我应允了宋先生的亲人之约。

对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宋先生就开始在做。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先生,在他的书房里我们谈了许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先生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惟有一句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语言学是一门边缘性科学,不能就语言研究语言,而应到语言之外,特别是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寻求解释。惟其如此,如今我们许多说不清的问题才能得以说清。”宋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在繁杂的语言学教学的研究中,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言学文献,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社会、历史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特别是语言学理论解决语言学研究中的某些课题,构筑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理论基石,为我们留下了这部前无古人的不朽名著。

在中国语言学界,提起宋振华教授无人不晓。在南方学子心中,宋先生以严谨深刻令人仰慕;在北方学者眼里,宋先生又以博

学敏锐闻名遐迩。早年的《语言学概论》到后来的《语言理论》，再到这部《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都充分体现了宋先生那严谨深刻的治学精神与为人之道。尤其是这部《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把这位大师的人格与学问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把握人类社会语言的本质，为了揭示人类语言发展的规律，为了中国语言学事业的繁荣，先生穷经浩首，惨淡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逐字推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经济学话语，敏锐捕捉导师们对于语言的洞见，深刻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学思想，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当代中国语言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课题。这种圣徒似的敬业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着实令人景仰。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学界部分人玩味“纯知识”，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下，先生无疑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就此意义而论，本书的出版，其价值已远远超过了知识本身。

从我的观点看，《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与其说是一部理论语言学文本，毋宁说是一部人文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更合适些。尽管本书的视域定位于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学思想研究，但其所涉猎的内容却扩散到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符号学、公理学、神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诸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开了广泛的对话，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社会、人际关系理论的调查，结合先生多年来从事理论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全方位地考察了人类语言与人本身，与人类社会，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及精神生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类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感性世界，一种交往媒介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特别需描述的是，在这部文字不多的专著里，先生的思想拓及到了多少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一直没有涉足的领域，理论地解答